

第二章 爱情小说创作追求

第一节 理想化的爱情

在人的生活中，最离不开的往往不是工作、金钱这些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。一般地说，社会成员都有两种基本的需要，一种被称之为工具性需要，另一种被称之为表达性需要。孟子有名言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。女作家苏青会大胆地重新句读为“饮、食、男，女人之大欲存焉”^{[1] (P175)} 指出了女性的基本生命欲望：饮食与繁殖。在生活中，女人们需要的是“男人的爱”和生活保障。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大事。男婚女嫁在封建社会中都遵照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在这种包办制度之下，妇女深受其害。进入二十世纪后，虽然包办婚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逐渐淡出，但影响还存在。婚姻不只是男女两人的事，而是男女双方家庭的承认。事实上，在包括中、泰两国社会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中，绝大多数人在考虑婚姻的时候，爱情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，更多考虑的却是两人的家庭是否“相配”。对张爱玲与素婉妮这样的女作家来说，她们笔下的女性虽努力追求“婚姻”、“男人的爱”和“安稳感”，但这其实只是整个婚恋过程中的主观努力而已，她们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。例如这四个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：

《金锁记》的曹七巧有着悲惨的婚姻生活，抓不到男人的爱，只有财产是她唯一的安稳保障。七巧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，因出身低微，倍受歧视，而自小瘫痪的丈夫，使她陷入情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，纵然她在夫死公亡后分得一份遗产，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、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，已使她人性扭曲，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，只知一味敛财，了无亲情，甚至戕害儿媳，断送女儿的婚姻，不断寻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，变得极其自私、乖戾又刻毒、残忍。曹七巧的人性所以被践踏、受残害，因为她缺少了男人的爱与婚姻的安稳感。曹七巧说：“男人的心，说声变，就变了。”^{[2] (P104)}

《倾城之恋》的主人公白流苏遇到失败的首次婚姻，她希望以再嫁为生活赌本。这种再嫁，当然没有爱情可言。白公馆是上海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，白流苏离婚后归回娘家遭到无情冷遇，一时被娘家人讽刺的流苏仿佛被监禁的样子，遇到了风度翩翩

[1] 转引自余斌.张爱玲 [M].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, 1993.

[2] 张爱玲.张爱玲文集·色, 戒[M].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7.

的范柳原。流苏这时唯一的出路，是既能离开娘家又能寻求经济上的稳定，但范柳原只希望满足性欲而已。流苏认为：“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，是一件艰难的、痛苦的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^{[1] (P141)}

《甘医生》的哈勒泰有惨痛的婚姻生活。她感不到男人的爱，只有在虚幻中建构自己的安稳感。哈勒泰选择了很可靠的甘医生为终身伴侣。她和母亲信任做医生的职业是很光荣，能给她带来了丰衣足食。在甘决定离开城市，按照他的理想到遥远的乡村去治疗穷人后，哈勒泰起先也欣赏丈夫崇高的事业。但时间一长，哈勒泰发现丈夫的理想并不完美。人民崇拜甘医生的贡献，但并不能给甘和她以经济上的安稳感。哈勒泰觉得丈夫的理想破坏了自己的婚姻生活。哈勒泰说：“甘！我想有自己的房子。我想房子，想孩子，可是，我一样也没有。”^{[2] (P118)} 甚至把她的丈夫和以前的男朋友做比较：“哈勒泰笑了，她想多蒙究竟是怎样摸透她的心思的呢？假如甘有他一半了解她的话，她就会感到幸福了。”^{[3] (P149)} 哈勒泰上了自己的陷阱，她爱的人不能嫁，就嫁给爱她的人，因为不能获得任何安稳感，最终她觉得连什么都没有。

《虹彩之梦》的兰袍有多次悲痛的婚姻生活。她只遇见虚伪爱情，她的幸福被金钱权利埋没了。兰袍的首次婚姻是由父亲安排，为了提高家族的身份与增加自己的权利，嫁给一位大将军的儿子。而他却是个同性恋。讨厌女人，不能给女人任何幸福，只是娶老婆讲面子。兰袍瞒着丈夫与人通奸，但不久她就发现她的奸夫对她也没有真爱，只是希望得到她的财产。当不男子汉的丈夫被同性伙伴杀害后，兰袍感到了自由，而且还能碰到了一位男子，一见钟情却不能相好。他已婚了。但他为了得到兰袍还想离婚。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而这时兰袍的父亲遇了地位下降，需要兰袍再嫁给一个富翁。为了维持家庭经济，兰袍不得已被父亲卖给第二个男人。她心理还奢望能跟她爱的男子重归于好，但她爱的男人却又跟自己的大老板娘发生了性关系，最终兰袍的第二位丈夫也因吸毒而死。兰袍的再次结婚又彻底失败。没有一个男人能给她真正的爱情。兰袍心想：“当飞机着陆时，会有他来接而带着兰袍回家，但实际上兰袍什么人

都没有”。^{[4] (P547)}

“爱情又不能当饭吃，总不能饿着肚子谈爱情”。曹七巧与兰袍都攫取不到男人的真爱，才以男人的金钱为生命的安稳感。白流苏和哈勒泰想得到生命的安稳感才乞求

[1] 张爱玲.张爱玲文集·色, 戒[M].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7.

[2] 素婉妮·素坤塔著(龚云宝、李自珉译).甘医生[M].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1980.

[3] 素婉妮·素坤塔著(龚云宝、李自珉译).甘医生[M].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1980.

[4] 素婉妮·素坤塔.虹彩之梦[M].曼谷: 社益出版社, 1997.

男人的爱与婚姻。张爱玲与素婉妮二位女作家共同表达“理想化的爱情是无存在的”这一主题。由于男人的爱的暂时性，无永恒，不管是否有婚姻为保障，爱情总是容易消失，剩下的只是内心中痛苦、心酸、苦楚、背叛的永恒感受。而且两人共同遭遇过爱的受伤，她们感受的爱是苍凉，尽管她们追求的是永恒毫无完美的爱。

第二节 女性的意识

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·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“圣经”的《第二性别》一书中，通过对漫长的男女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，得出“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，女性的所有‘女性’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。”^[1]这一著名论断，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，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“第二性”或曰“次性”。在世界的历史上，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。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、即男权社会、夫权社会后，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，发泄性欲的工具、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。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，“妻”“妾”皆从女，有长跪的形态，这都是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。中国与泰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，所以在张爱玲与素婉妮笔下通过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刻画，注重女人“次性”的地位。如，

白流苏代表中国旧社会的女性，她得不到读书的权利、没知识、靠夫养活、离婚等于失败，连娘家也不欢迎回归。流苏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再好些，得不着异性的爱，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。女人们就是这点贱。”^{[2] (P123)}这是张爱玲对中国男权社会的批判，女人身不由己，好坏也不在于自己，需要依靠婚姻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。这就是传统宗法观念所谓“好男走到县，好女不出院”的意义。

哈勒泰代表了现代女性，她大学毕业，不崇拜物质，对婚姻有期望，喜爱舒适方便，虽不想富裕也不想受苦，但在哈勒泰身上还存在依赖于男性中心的思想。素婉妮对此作了仔细描写：

“哈勒泰啼笑皆非地想：难道这样的赞扬就是甘所需要的吗？而他本人工资几
乎入不敷出，尽管已经再三地克扣和节省了。……假若甘调回曼谷的话，那情况

[1] 存在主义：<http://www.hudong.com/wiki/>

[2] 张爱玲.张爱玲文集·色，戒[M].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7.

就会比眼前更加困难了。如果不回娘家去住，她就得租房子，可是甘的薪俸连租幢好一点的房子都不够，更甭说其它开销了，至于攒钱的事就更无从谈起了。她为未来的生活担忧：将来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呢？她想自己挣点钱补助家用。然而，在这样的乡间小镇，她能干什么呢？来找甘医生看病的人，有些，病已治愈，临走时还向甘要车钱，而甘也总是设法筹给，每月这样的额外开支也不少。并不是哈勒泰小气，经常这样叫她怎么没有一点想法呢？”^[1] (P96)

素婉妮提示了妇女在婚姻生活的抑郁。虽然哈勒泰代表了现代女性，有知识和职业的女子，但结婚了也要听从丈夫，以丈夫看法为主，为了跟着丈夫的理想主义，她必需抛弃城市里的工作与生活，这也是素婉妮对泰国男权社会的倾诉。

这些次性地位上的女性人物，其中有不少可以被解读为反父权文化编码的女性文本策略。虽然，这些女性的主体性以残缺不全、甚至支离破碎的形式出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表露，如，

曹七巧的极端个性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这种“小资”的东西。‘小资’是对情感、对生活有一种自己的执着，极端强调个人色彩的一种个人主义性的东西。它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增强而凸显个人色彩。对有些人来讲，消费能力虽然不够高层次，但也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，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。张爱玲在出版《传奇》的1944年，有《自己的文章》一文诠释了她对小说人物的理解，认为自己笔下“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，”“除了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。”^[2] (P173) 曹七巧也是张爱玲的小资人物，她敢做敢为。虽然因父权社会压抑使她错过爱情与婚姻美满的生活，但她甘心为了自己的黄金欲望，不再给自己或她爱过的人姜季泽的相爱机会。张爱玲描写为：“季泽立在她跟前，两手合在她扇子上，面颊贴在她扇子上。他也老了十年了。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！他难道是哄她么？他想她的钱——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？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。”^[3] (P89) 张爱玲擅长心理刻画，她把曹七巧的病态心理描写成颠覆传统的英雄，报复中国男权

[1] 素婉妮·素坤塔著（龚云宝、李自珉译）.甘医生[M].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1980.

[2] 金宏达，于青编.张爱玲文集·第四卷 [M].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2.

[3] 张爱玲.张爱玲文集·色，戒[M].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7.

社会的女英雄。

兰袍的社会地位较低，她出生于泰国华侨家庭，家庭以父权为中心，做买卖为主，教育为轻。无论父亲要她停学来做买卖或结婚，目的都是为了父亲扩大业务的需要，且她都不能拒绝。通过两次彻底失败的婚姻与两个不忠贞的奸夫。最终能觉悟了的兰袍对朋友说：“怎么总是想着我一直要找老公呢？我怎么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活，自己养活自己呢？”^{[1] (P575)} 素婉妮通过女主人公表达她对女性的看法，即女性应该有自由性，不必依附于男子。另外，还通过另一个女性人物表示了对男女平等的看法为：“没办法啊！若男子能有小老婆，我们女子会有自己的出路，我是觉得男人会狎妓，我们女人也会有个奸夫，就没事吧！”^{[2] (P518)}

总之，在张爱玲与素婉妮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上，我们都明显发现女性是社会次性的地位。无论是曹七巧、白流苏、哈勒泰与兰袍都服从在中泰两国“男性中心”的传统意识。白流苏与哈勒泰是一种老女子，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意识。而曹七巧与兰袍便是一种新女子，有个性解放的思想，虽被男人负心和制度压抑，但还能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做点反抗和挣扎。尤其是曹七巧虽不能自选婚姻但自选了婚后的经济安稳感，放弃了爱情，只为金钱过日子，甚至破坏了儿女的幸福也是为了金钱，她独特个性能反映出作家张爱玲的叛逆性。当女性被封建礼教束缚到顶端，她会极端巨大的报复。而兰袍的最后觉悟，是决定不依附于男人，以及隐含提示男女有平等平权，这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素婉妮思想的解放性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能认出二位女作家共同深受西方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思想，共同希望能建立一个男女“平等相均”，“个性自由”的理想社会。

[1] 素婉妮·素坤塔.虹彩之梦[M].曼谷：社盆出版社，1997.

[2] 素婉妮·素坤塔.虹彩之梦[M].曼谷：社盆出版社，1997.